武汉解放前党的地下工作

李笙清

1949年5月16日至17日，武汉三镇兵不血刃获得解放，广大市民载歌载舞，欢庆江城武汉回到人民手中，武汉的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在武汉解放前，中共地下组织冒着流血牺牲的风险，在武汉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取得敌人的情报，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秘密统战策反工作，为武汉的顺利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汉人民庆祝解放

巩固、发展党的组织，积极开展统战、策反工作

抗战结束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陆续派出赵忍安、李声簧等一批骨干同志到武汉重新开辟党的地下工作。1946年春天，中共南方局派曾惇等人来到武汉，与先期到达的同志汇合，重建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组织、领导了武汉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罢课、罢工斗争。1947年11月，中共湖北省地下工作委员会成立，曾惇任书记，陈克东负责湖北地区长江两岸工作，李声簧负责统战和宣传工作。不久，中共武汉地下工委成立，刘实任书记。

1948年7月，中共武汉市委员会正式成立，曾惇任书记，江浩然为组织部长，张文澄为宣传部长（11月到任），组成常委会，陈克东、刘实为委员。同月，江汉区党委城工部汉口小组建立，刘建章为负责人，在汉口警察局系统开展策反工作。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还相继在工人、职员、教师、新闻工作者、妇女积极分子中，建立发展秘密外围组织，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在工人、青年、妇女和爱国人士中开展工运、学运以及其他民主爱国运动。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还运用各种条件，建立秘密收听站、地下印刷厂，创办油印小报，广为散发，并大量翻印《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毛泽东著作及中共中央文告等重要文件，对国民党党政军人员加强形势、政策的宣传。

据1946年6月15日中共武汉市委给中共华中局的反映武汉解放前地下党情况的报告中显示，中共武汉地下组织的主干是由中共武汉市委领导的390名党员（长沙、大冶、沙市等处除外）及1500至2000名党外核心分子（主要在大的学校、企业中）；另一系统是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及各解放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计11个城工部，共有派遣人员和各种城工关系约2800人，其中党员50余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约950人。

经过不懈努力，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与各民主党派保持密切联系，广泛地团结和争取了工商界、科技界、教育界的一批爱国人士，结成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武汉解放前夕，武汉爱国民主人士不顾国民党当局的胁迫，坚持留在武汉，和群众一道保护工厂学校和武汉地区公共财产设施。

在党的领导下，武汉人民保护城市完整回到人民手中

在武汉解放前夕及国民党军逃离、解放军进城之间的这段时间里，中共武汉地下组织利用一切社会关系，积极争取民主人士，放手发动群众，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护厂、护校、护公共设施的活动，反搬迁、反破坏，保护了城市的完整，为武汉顺利接收打下了基础。

中共江岸铁路支部和武汉工人解放先锋队在平汉铁路局江岸机车厂和机务段、车务段、工务段等职工中组织“保产活命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并策动武汉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兼平汉铁路局副局长邬浩、国民党平汉铁路局特别党部主任刘松山等人暗中配合，参加了职工的保产护路斗争。

国民党军队南逃前，命令对武汉电信局的电讯设施进行破坏，中共武汉市委、中共鄂豫三地委和江汉三地委城工部所属地下组织团结上层，发动群众，在武汉电信局开展了护局保产斗争。面对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督促拆机南迁的命令，在中共武汉市委的领导下，电信局党支部、武汉人民解放先锋队电信局支队、江汉三地委城工部电信局团支部分别发动、组织群众，在局长尤箕照、总工程师祝秉珩的支持下，成立了局应变委员会，发动职工分散转移、隐蔽重要通讯设备和电讯器材，并组织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放哨，坚守在电信局大门口，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军爆破队的破坏，制止国民党散兵游勇的骚乱和趁火打劫，同人民一道迎接武汉的解放。

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

中共武汉地下组织对武汉社会情况和敌特状况进行调查，由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组织编辑成《武汉调查》及《武汉调查（补篇）》资料40余万字，送往解放区，在郑州出版后随南下大军送到武汉，对中共中央中原局和第四野战军制定进入武汉的军管手册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武汉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下，大批国民党党政军警各界首脑和核心骨干人员投向人民。中共武汉市委于1949年2月建立了以陈克东兼组长，吴明勋、陈陶、尚家齐为成员的策反工作组，对武汉国民党官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策反活动。中共武汉市委派党员胡铭心策反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陈良屏，陈陆续交出国民党省党部组织系统表、省党部直属“中统通讯社”（特务系统）的资料及两次省党政军甲级联席会议记录等重要情报资料，为武汉解放后军管会肃清国民党特务发挥了一定作用。经中共江汉三地委城工部争取，汉口市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长胡武将准备撤退到沙市的保警总队1500余人枪留下，迎接解放，并参与了维持汉口社会治安的工作。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武昌市市长蒋铭、汉口特别市政府秘书长杨锦昱、警察局局长李经世、湖北省会警察总局局长胡慎仪等国民党政权高级官员均被中共武汉地下组织策反，有力地配合了武汉的解放、真空时期的社会稳定及城市各项接收工作的顺利完成。

在武汉解放的过程中，国民党高级将领张轸的阵前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武汉解放的历史进程。张轸在武汉解放前任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十九兵团司令、河南省主席。早在抗战时期，张轸就曾先后与周恩来等共产党领导人见面，从而对共产党人有了全新的认识和评价。解放战争时期，张轸多次派人前往解放区联系，并接受中共指示，决定将起义时间定在解放军发起解放武汉战斗之时。1949年4月间，张轸又三次赴长沙与老军长程潜密谈，相约张轸先于武汉举义，程潜后在长沙行动。1949年3月，张轸率部退到湖北，在武昌以南沿江一带担任江防任务。5月10日，张轸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的通知，派人由金口渡江到沔阳县彭家场，与解放军拟定起义计划。5月15日，即武汉解放的前一天，张轸率所部2.5万余人在武昌以南的金口、贺胜桥一带举行起义。张轸部起义打乱了白崇禧的南逃计划以及破坏武汉的计划，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先遣兵团的军事行动，加速了武汉解放的历史进程。

制定并公布《致武汉人民书》，为接管工作做准备

为迎接武汉解放，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在武汉内线工作的同志，以武汉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公布并印发了《致武汉人民书》，对党接管城市的各项政策进行详细说明。

《致武汉人民书》对国民党党政工作人员采取的是分别对待的方针，即首恶必办，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做过坏事的只要脱离蒋介石反动集团，准其悔过自新，立功赎罪。对国民党官兵，只要放下武器，战斗结束后一律尽早释放，起义及配合我军行动的官兵，一律按照人民解放军军制整编，政治上与人民解放军一视同仁，待遇也与人民解放军一律平等；对国民党中统局、军统局及其公开和隐蔽的特务机关等一切反动组织，即日解散，停止活动，各该组织人员要依法向指定的机关登记，交出武器和一切反动证件，分别首要、胁从，分别发落，而对隐瞒不报或继续潜伏、阴谋活动者，一经查获，定予严办，并要求所有旅社、公寓、医院、茶馆、戏院、妓院均不得包庇隐藏国民党特务人员，否则一经查出当予以惩罚。

在经济方面，《致武汉人民书》提出：国民党的企业、商店、医院、房地产、市政机关及其各单位，是人民自己所有的财产，要妥为保护，不得损坏、拆卸、转移，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予以接收；属于私人的企业、商店、医院、房地产，都在保护范围之内。为稳定市场，所有民营工厂、商店应该继续开工、开市，加强生产，照常营业；并呼吁所有工厂、企业生产部门的职工严守岗位，照常工作，加强保护，继续生产，为人民服务。对有决心、有思想、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希望他们“大批的参加到人民解放事业和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中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

这份《致武汉人民书》的公布，起到了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为即将建立的武汉人民政权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者单位：武汉博物馆）

孙中山驻节桂林

贾晓明

篇后拾遗 PIANHOUSHIYI

1921年底，孙中山进驻桂林，拟从这里取道湖南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实现全国统一。

12月4日，孙中山乘船到桂林市郊登岸入城。桂林市民扶老携幼挤满了街头，都来一睹孙中山的风采。7日，桂林政、军、学、商各界76个团体隆重召开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

孙中山抵达桂林后，立刻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又称北伐军大本营），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宣布行使战时最高统帅职责，同时建立北伐大本营各个机构，统一北伐各军供给、训练和作战等方面的行动。

当时，会师桂林的北伐军有粤、滇、黔、赣等各路武装4万多人。12月14日，孙中山召集各路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宣布参加北伐的南方各省也都派代表参加。会议决定，北伐军分兵两路：第一路“进取赣南、鄂东”；第二路“出湖南，取道长岳”；然后两路会师武汉，直抵幽燕。随后，孙中山还命令在进军路线上“每隔六十至七十里设一兵站分处，购备军粮及各种军用物品，以便补给北伐各军”。

为了把北伐军各部组织得更严密，使之更有战斗力，孙中山把军队重新分成七个军团。为严格约束军队纪律，孙中山设立了宪兵司令部，由大本营直接调遣，派宪兵巡视、纠察各部队风纪，禁止骚扰百姓。

孙中山非常重视军队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工作。12月10日，驻桂林的粤、滇、赣三省军队全体军官举行欢迎大会，桂林各界代表应邀参加，孙中山即席演说《军人精神教育》，阐述了三民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革命的任务，要求军人“立定决心”“同负革命责任”。为了培养军队的革命意志，他还多次围绕军人精神教育这一课题，发表阐述，要求军人做到“智”“仁”“勇”兼备，熟练掌握“命中”“隐伏”“耐劳”“走路”“吃粗”等技能。

此次孙中山北伐的重点，是直系军阀及其控制的北洋政府。为此，孙中山先后会见了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张作霖的代表李梦庚，希望联合各派力量共同讨伐直系军阀，“以成戡乱之功，完护法之愿”。

12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共产党人张太雷的陪同下到达桂林，和孙中山举行了多次会谈。双方就关于改组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扩大对群众的宣传、国共两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事项进行了探讨。孙中山还邀请马林向北伐军军官们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并同张太雷就发动青年积极参加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孙中山不顾戎马倥偬，还抽出时间召集当地官绅，对桂林今后的开发和建设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他指出：桂林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就需要引进资本，大力“筑铁路，开矿山，树农场，兴工厂”，开发旅游资源，更需要普及教育，培养人才，重视科学技术。孙中山还亲自参加桂林至全州公路的破土开工典礼，还捐资万元，补助桂林中小学的教育经费。

孙中山在桂林期间经常接见群众，并不时外出视察，体恤民情。为出行方便，他还临时雇穷苦小孩当向导。孙中山外出时，每到一处必和群众亲切谈话。桂林市民各种团体组织经常向孙中山请愿陈情，孙中山都亲自接见，并告诉大家：“人民所请愿之事，政府当尽力为人民办之。”对能解决的问题，他立即命令着手解决。一次，桂林学联组织的新中国学社负责人李文钊、李征凤等，去找孙中山募捐，孙中山亲切地接见了他们，给他们捐了一笔款，还帮助他们把一座县文庙改建为社址。

随着北伐诸事准备就绪，孙中山心情甚佳。12月31日，桂林下雪，孙中山在大本营召集各军将领举行茶话会赏雪，迎接新年。席间，他取出一个重约三四十斤的大蛋糕，由夫人宋庆龄切片，分给与会各将领共享。

1922年1月1日，孙中山宣布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北洋政府的五色旗，并在大本营举行了升旗仪式。

随后，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颁发了北伐总动员令，并举行了北伐誓师典礼。但就在此时，他接到报告说：坐镇广州的陈炯明不仅秘密勾结北洋政府，还暗杀了为北伐军调拨物资的邓铿，并煽动滇军将领唐继尧带领部分军队脱离北伐军，更唆使湖南督军赵恒惕拒绝北伐军进入湖南……对此，孙中山在大本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经研究决定：先行回粤震慑陈炯明，再改道北伐。4月，孙中山率部离开桂林。

中央苏区儿童节大检阅

钟同福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少年儿童的教育工作。中央苏区时期，各红色根据地几乎村村办起了小学。师资不够，就开展师范培训教育；没有校舍，就把祠堂腾出来；没有课桌板凳，就用门板和砖头搭起台子；组织人员专门编写小学课本。苏区中央儿童局更发出号召，要求共产儿童团组织动员儿童入学，并要求“在学校里开展娱乐体育工作，组织游戏、唱歌、演活报剧、打球、开晚会等，使学校生活非常活泼有味”，使儿童愿意上学。经过宣传动员，苏区儿童基本进入小学。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苏区儿童不仅获得了文化知识，思想觉悟也有了很大提高。

为了打破国民党严酷的经济封锁，苏区儿童积极行动起来，组织“肥料队”“养牛队”等加紧开垦荒田荒地，并积极参加扩红宣传，开展拥军优属工作。为了支援前线，苏区的儿童自发组织了各种捐献活动，如江西的儿童团员捐献了一架“红色儿童号”飞机；闽粤赣的儿童团员回收了3万多个子弹壳送给兵工厂；湖南、江西的儿童团员组织扇子队，在红军战士休息时，给红军送水、打扇。各地儿童团员们踊跃参加“少共礼拜六”义务劳动，帮助红军家属看牛、砍柴、积肥等。此外，他们还组织起来，积极投身于苏区的建设，积极参加站岗放哨、植树造林、积肥开荒、破除迷信等各种活动。

1933年1月5日，苏区中央儿童局发布文件，将4月1日定为儿童节。此后，随着红军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中央苏区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为了展示苏区儿童的精神风貌，苏区中央儿童局决定在当年4月1日儿童节当天，举行儿童团大检阅。

4月1日，苏区中央儿童局在江西瑞金叶坪举行了中央苏区儿童团大检阅。当天，会场布置一新，会场中央停着一架“红色儿童号”飞机一架；检阅台位于会场西端，台中央挂着中央政府赠的“红色儿童团结起来”的彩联，左右两边是“学习共产主义”“将来主人翁”等彩联与横匾。

在开幕礼举行前，总指挥要求各队登场表演。于是，各队儿童纷纷登台大显身手，“有唱歌的，也有做游戏的，各有不同，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他们的表演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

检阅开始后，在雄壮的军乐声中，随着苏区共产儿童团“四一”大检阅的红旗升起，全体儿童向红旗敬礼。在总指挥讲话后，少共中央局、中央政府、全总执行局、中央总队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学校机关代表依次致训词。当少共代表问：“做将来社会主义的主人！准备好了吗？”全体儿童齐声答道：“时刻准备着！”

各机关代表致词后，宣读了中共中央、中华全总以及红军第一三五军团的贺电。最后，参加检阅的儿童团员们高呼口号，齐唱共产儿童团大检阅歌。声音嘹亮，响彻云霄。

平江起义中的李灿

杲学军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1918年，李灿进入湘军当兵，和彭德怀、黄公略相识，三人由于志同道合，成为好友，并一起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

大革命时期，李灿加入国民革命军，投身北伐战争。其间，他积极追求进步，接触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确立了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奋斗的决心。

大革命失败后，李灿所部被国民党当局改编为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彭德怀任该师第一团团长，李灿任一营二连连长。1928年春，第五师建立了中共的秘密组织。4月，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彭德怀入党后，第一团成立了党的秘密支部，成员有彭德怀、邓萍、张荣生和李光，经支部讨论，又吸收李灿、李力入党。接着，黄公略从黄埔军校毕业归队，并带来共产党员贺国中、黄纯一主持随营学校。第一团的9名党员，很快成立了以彭德怀为书记的团党委，并通过对广大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加强了士兵的团结，提高了全体士兵的政治觉悟。在此基础上，彭德怀召集党员开会，要求从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

6月中旬，独立第五师奉命开到湖南平江县镇压当地的工农革命，彭德怀率第一团主力进驻平江县城。7月17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到达平江，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关于准备在必要时举行起义的指示。18日，彭德怀截获了国民党当局准备逮捕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的密电。在此紧急情况下，彭德怀、滕代远、邓萍、张荣生、黄纯一、李灿、李力、李光等人于当日晚7时开会，决定在7月22日下午1点钟，乘敌人午睡时举行起义。会后，滕代远和邓萍搬到李灿的住处，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起义准备期间，李灿带领士兵骨干侦察敌情，摸清了城里敌人的人数、布防和作息时间，同时协助彭德怀撤销了团里个别反动分子的职务。7月21日黄昏，一切准备就绪，李灿命令参加起义的士兵好好休息，自己则回到家中，帮助邓萍连夜赶制起义标语和宣传品。

7月22日中午，起义部队集合在天岳书院前的广场，由李灿向集合的士兵宣布：脱离国民党军队，举行武装起义。说罢，李灿带头除掉大盖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系上红领带。接着，彭德怀向部队宣讲了起义的意义、目的和任务。随后，李灿等人分头率领起义部队攻占城内要点，消灭了顽抗的敌人，解救出被关押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600余人。

起义胜利后，李灿一面带领宣传队张贴布告标语、散发传单，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一面迎接中共平江党组织率领的游击队和黄公略、贺国中领导的起义部队进城会合。随后，中共平江县委和起义部队召开庆祝胜利大会，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五军，李灿任军委委员兼第一团党代表。同年底，李灿随红五军主力奔赴井冈山。

桐岐战斗，开创苏南东路“我军歼灭战之先声”

常红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忠救军”澄锡虞（江阴、无锡、常熟三县交界地区）军事专员兼江阴县长王文甫与“忠救军”澄锡虞别动大队长高杏宝部会合，频繁向新四军江南抗日救国军（简称“新江抗”）部队挑衅，遭到“新江抗”部队的坚决反击。1月30日，新四军审讯俘虏得知，王文甫、高杏宝率残部窜至双漏里，于是调集第二、第六、第七支队400余名指战员，在参谋长张开荆、第二支队支队长陈挺的率领下，于31日下午3时出发，兵分两路，迅速向双漏里挺进。

王文甫、高杏宝残部一触即溃，一面逃至青旸以南，企图在日伪据点的庇护下苟延残喘，一面派汉奸到青旸日军据点告密，挑唆日军出兵“反击”，企图借日军之力消灭新四军。

青旸据点的日军闻讯后，立即出动部队，沿公路直奔桐岐，准备向新四军集结地王大坝偷袭，被新四军设在桐岐的岗哨发现。七支队指战员听到枪声，火速赶来支援，用机枪封锁敌人前进的道路。张开荆、陈挺得到报告后，从容地站在万安桥上指挥战斗，命令第二、第六支队战士从左右两翼向敌人包抄，很快对敌人形成了反包围。日军发现新四军大部队袭来，慌忙向一处小庙周围收缩，并在庙外架设机枪，又向空中发射紧急救援信号弹，企图固守待援。新四军战士借着夜色匍匐前进，向敌人重机枪阵地接连投掷手榴弹，压制住敌人火力，然后一跃而起，击毙敌人的重机枪手和弹药手。庙外日军失去火力掩护，全部逃进庙里，凭借坚固的高墙继续顽抗。为迅速解决战斗，新四军指战员架设木梯，爬上屋顶向庙里投手榴弹，再用火油点燃草木火攻，很快突破院墙，将残敌分割包围在庙内的几间房内。几名日军垂死挣扎，躲在佛像后面放冷枪，被新四军接连打倒。随后，新四军发起总攻，展开逐屋战斗，很快将暗藏的残敌消灭。

此次战斗，新四军共击毙日军27人，毙伤俘伪军15人，缴获九二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三八式步枪20多支、掷弹筒1支、弹药数箱。为防止日伪援军反扑，新四军在打扫战场后连夜转移。事后得知，有一个日本兵因跳进庙后粪坑里躲藏得以逃脱。

此战的胜利，有力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反共的真相，极大鼓舞了江南抗日军民的斗志，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特致电嘉奖，称赞此战开创苏南东路“我军歼灭战之先声”。